

情報老卒的回憶 (上)

王立生遺著。費雲文校訂

王立生先生，從事情報工作數十年，最初追隨鄧文儀將軍，民國廿三年改隸戴笠將軍，曾經三次負責江西省情報站，任站長，大陸淪陷時，間關潛入四川成都，隨遇而安；最後脫險來臺，在國防部情報局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任內，自請退休後因病逝世。茲屆王先生逝世十週年之期，特就王先生原著尚未公開發表之文，校訂編纂成篇，送請中外雜誌刊登，以饗讀者並紀念這一位忠勇愛國的情報先進同志。

費雲文七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熊式輝講「情報工作」

民國二十一年秋，我任職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秘書處三科少校科員，科長鄧文儀先生。科址設在漢口俄租界俄領事館內。時正以復興革命，剿滅赤匪為號召，同事多屬一時英俊，工作振奮，朝氣蓬勃，充分表現出一種革命復興曙光在望的現象。

二十二年春，委員長南昌行營為蒐集情報，

防剿共匪，曾有調查課之設立，課長為鄧文儀先生兼任。我奉調升調查課中校股長，任職僅數月，又奉調贛省保安處中校課報股主任（課報股一職，原決定王兆槐兄，嗣王調浙省保安處課報股長）。當時全國僅豫鄂浙贛四省保安處成立課報股，以後因剿共環境的需要，其他各省保安處亦多設立此一機構。

課報股係一公開掩護之機構，實際上乃「江西省站」秘密工作的掩護。因省站下密設有南昌、九江、景德鎮、萍鄉、臨川、吉安、贛縣等組，為工作指揮便利計，須有一公開機構，以作掩護。

這是我第一次主持調查課所屬的「江西省站」，為時約一年——二十二年六月至二十三年四月。

當我就任贛省保安處課報股主任伊始之際，有一事足紀。江西省保安處，原稱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係由贛省主席熊式輝天翼先生兼任，後改稱省保安處由廖士翹（日士官生，大陸淪陷時投共，終被中共清算處決）接充。

那時候，熊天翼先生是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

，兼主贛政，領袖對之信任有加，正是聲勢顯赫，不可一世之際。有一次鄧課長雪冰曾請熊先生蒞臨調查課，對課內外勤同志講演，以「情報工作」為題，熊先生善於言詞，口若懸河，對於本題，如數家珍，發揮盡至，約二小時，聽者動容，欽佩之至。那次講演，鄧課長指派我擔任記錄，那時候是無錄音機可資記錄之助，純靠耳聰手敏。熊先生講詞主要的內容是：「用人必疑，疑人必用」，「隔離式的組織」，「圈套式的經驗」等妙論，並列舉中外許多情報史例，莊諧並陳，聽者大有嘆為觀止之概。鄧課長對於我此一記錄甚表嘉許，後來他將此一講稿，送給熊先生過目，似乎他對此一記錄之人也有深刻和不壞的印象。

某一日，我拿着行營要我即日往江西省保安處課報股到差的訓令，和鄧課長特為我介紹熊主席的信，當由省府傳達處將我帶至省政府西花廳，時熊主席正在花廳裏一張長條桌上向十來個官員談話，他們大概都是來自各縣的縣長專員等僚屬，我被命端坐在長桌的末座，靜靜地聽完熊主席對他們的垂訓之後，我將鄧課長的介紹函恭敬

的向他送上。他用目稍覽後，便詢問我：「你是那裏人？」「江西萬安。」我回答。「現在調查課任何職？」「中校編審股長。」「你學過速記沒有？日前我在調查課的講話，你的記錄我看過了，記得很好。我現在需要一個速記人才，你願擔任嗎？」他急切地說下去，但無片語涉及課報股如何成立的事，當時我心裏甚感不耐。我想我此來目的是向他報到，並請示課報股今後工作進行事宜，殊未料及他竟「王顧左右而言他」。我乃率直地回答：「速記是一種專門的學問，我從未學習過且我無志於此。」接着，我又詢問：「課報股何時可開始工作？」熊主席乃說：「成立課報股事，我正在計劃中，最好你除課報股職務外，並兼任省府速記工作。」我原在調查課編審股工作，甚感勝任愉快，正在按着計劃，逐步進行之際，中途調離，本非所願，現在又有一種非志所欲的工作，加諸我身，不僅非始料所及，抑有種被侮辱的感覺，年輕氣盛的我，心中無法忍受，正在此際，熊主席突對我說：「我今天對在座人員的談話，請你替我記錄下來看看！」這無異是給我一個當面考試，我心想「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乃回答他說：「報告主席，我沒有注意聽！」說完此語之後，立即起身向他告辭。

顯然的，這次我與熊主席會晤的結果，造成一個最尷尬的局面。

我由省府返回調查課後，立將晉謁熊主席的經過，報告了鄧課長。他僅僅微微地笑着，也沒有說什麼。我依舊在編審股工作如故。課報股成立鬧成僵局，約二個月之久。豫鄂浙等省保安處的

課報股均已先後成立了，只有江西省保安處的課報股，尚在難產中，杳無消息。有一天夜晚，南昌省會警察局長黃光斗（曾任江西省立第一師範校長），忽臨寒舍，寒暄後，他就將來意告訴我，說熊主席對兄甚器重，希望我早日到差，開始工作。我想大概是熊式輝主席想到各省課報股的組設，是奉委員長行營的命令，他既是一個以「領袖的股肱」自命的人，自然不會違背領袖的決定！

黃光斗先生是我平日頗為尊敬的師長，我接受了他的勸告，同時，贛省保安司令改組為贛省保安處，由廖士翹中將出任保安處長，課報組終於二十二年六月十日開始工作。

情報機構組織擴大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委員長行營調查課改組，鄧文儀課長辭職，戴笠先生奉命兼任課長，於是將軍委會調統局第二處（特務處）及行營調查課兩機構內外勤工作合併，重加部署，情報機構組織從此擴大。記得，當戴笠先生接收調查課之後，曾在南昌經堂巷調查課禮堂內，召集該課自副課長以下之內勤同志集合，即席訓示奉命接任之經過並表示對未來工作開展的信心，語多慰勉，詞極誠懇，訓示畢，並請各出席同志當場舉手表決願否繼續工作，當時百餘人中表示志願繼續參加工作者達十分之九以上。鄧先生部下大批有力幹部（包括漢口第三科）如徐業道、王新衡、李果誥、李葉、曾廣勛、郭壽華、吳廣恕、謝力公、劉哲民、唐玉珉、曾堅、李介民、嚴家誥及本人等，

均得以附驥於戴先生部下，繼續參加革命情報工作，甚感榮幸。同時，另一面，戴先生的工作機構裏，有了大批的新的生力軍參加，也等於是一個人的身軀內注入了許多新的血輪。據記載，兩機構工作合併後，人員由第二處初期之一百四十五人增至一千七百二十二人。戴先生以後事業之輝煌發展，第二處與調查課之合併，實有決定的作用，亦為團體工作發展歷史中的一個轉捩點。

戴先生接收南昌調查課不久，即臥病杭州，但仍力疾從公，念念不忘工作。最難能可貴的，是第二處調查課合併以後的雙方幹部，均能和衷共濟，合作無間，毫無新舊彼此界限之分，親疎之別。戴先生鑒於在此新舊交替之際，仍恐難免人心不安，曾特電告誡：「至由京調課各同志，務請堅囑其勿多言，埋頭做，待人接物，須力行謙和，調查課特務處之界限，尤須極力避免也。」（二十三年條已復柯建安同志電）總之，關於調查課合併事，戴先生自始至終，把它當做「此團體事也、調查課事也、同志們事也。」看待，毫無彼此之分，也無個人得失之可言。其大公無私，一至於此。

重作馮婦一波三折

二十四年，南昌調查課大部同志，奉命調南京任內勤工作。是年元旦，軍統局在杭州警校舉行「全國督察工作會議」，由戴先生親自主持。我奉命參加。會後返南京。我奉派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督察室督察（督察主任柯建安）兼任人事室考核股副股長，（副股長三，另為胡子萍、周康

），工作不久，即調任軍統局第二處第一科任華北股長（二十四年雙十節），科長為唐縱乃建先生。任職約八個月，二十五年五月一日，又奉調南昌任軍統局江西省站站長兼任軍委會南昌郵電新聞檢查所所長，這是我重作馮婦，第二次就任江西省站站長。

此次接長軍統局江西省調查站，工作開展，甚感棘手。其原因由於贛省站前任站長吳廷震（江西武寧籍，軍校四期生，大陸淪陷後投共）

，其為人言偽好辯，生活腐化，工作一貫作風為官僚主義，對於我之接任，事前百般阻撓，事後慫恿同志，多方搗亂。關於贛站那時工作環境惡劣情形，真是一言難盡，不欲在此多敘。僅照錄民國二十五年某月戴笠先生致吳廷震一電的電文如下：「溯自建安兄介紹兄負責贛站工作以來，原冀兄秉承領袖之意旨，體念領袖之苦心，埋頭苦幹，慎密佈置，調查各方確實之情報，以供領袖之參考，藉以推動革命也。奈兄自任事以來，不能認真工作，處處敷衍從事，致贛站原有之些許基礎，亦一塌糊塗，弟不得已，乃請立生同志前來接替，非對人也，實為事耳。詎日來迭據各方報告，兄竟惱羞成怒，慫恿站員，任意搗亂，似此故意破壞工作，實為團體紀律所不容也。特電忠告，盼速覺悟，如因此洩漏吾人工作之一切秘密，弟將唯兄是問。」

省站內外勤業務，經我一年來悉心整頓，與積極推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假使繼續的幹下去，江西的工作，可望有美滿的收穫。

民國二十七年，日寇的飛機已開始在全國各

地盲目的大肆轟炸。南昌的形勢，頗形緊急，我為了減少掛累，一面將我已懷孕而大腹便便的妻子和兩個男孩子，連同岳母全家老小，送往萬安故鄉居住；一面對贛省非常時期的應變工作，作積極的佈置，且已計劃於必要時將省站移設於南昌對峙西山一帶。我購置了大批電訊通訊材料及準備將來游擊戰時的一切用品。此外並吸收了許多地下工作人員，並預為佈置幾個秘密電臺的地址，和開設幾個便利掩護交通接頭的小商店。不料正在此風雨欲來局勢緊張之際，上級臨時派了蕭漫留同志來贛視察。漫留同志，贛德安人，我任南昌新聞郵檢所主任時，他曾任駐潯主任郵檢員。身材矮小，兩目斜視，能言善說，工於心計。他此次來贛視察，對我早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存心。因此，他到贛後不久，便對戴笠先生上了一個電報，略稱：「刻任江西省站工作之王立生同志，對工作缺乏勇氣，且其身份已公開暴露，似難適任於非常時期之工作，應請上級迅派一適當人員來贛接替。上級接電後不久，立即決定令派正在江西視察的蕭漫留同志就任接替，並飭即日接收具報。我奉電後，如釋千斤重負，甚感快慰。惟付早知如此，甚悔那時不該將我的妻孥送回故鄉，因為我的愛妻於回鄉後不到半年，竟因難產夭殤，與我成永別了！愛妻的死是我一生事業上一個無可補救的嚴重打擊。」

民國二十七年秋，我將贛省站長職務移交後甫三日，即搭車赴湘，原擬經長沙赴重慶軍統局本部報到。抵長沙後，我任青年會，翌日夜深，忽接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轉來戴笠先生自香港

特急電一件，電中大意是：「熊主席（天翼）對兒仍欲借重，盼中止赴渝，即速返贛任謁熊主席，結果如何希覆為要」云云。一個情報人員，既已將他的生命奉獻於團體，他的行止，自然是無法由自己決定的。我奉命後，毫無考慮，星夜搭車由長沙趕回江西省泰和縣上田村（贛省府所在）往謁熊主席，當蒙接見，他告訴我，他已奉命兼任江西省黨部主任委員，擬對省黨部人事，大加調整，已發表馮琦（中統局派任贛省黨部調查室主任）兼任省黨部組織科科長，李林為社會科科長，意欲我擔任宣傳科科長一職，特徵求我的同意，我當對他坦白表示對此一工作難以勝任。他說：「你對什麼工作才感興趣呢？」我回答他：「祇有對情報工作才感興趣。」至此，他表示要和戴笠先生再行商量。顯然，他對於這件事之弄成僵局，內心是不愉快的。最後，他要我在贛多留些時，每月省府並以優薪厚禮送我。此種坐領乾薪，無聊的客卿生涯，大約有半年的光景。

民國二十八年春天，我又奉戴笠先生急電赴西安天水行營調查課向張科長報到。

三任江西調查站長

抗戰時期，工作調動，異常頻繁。人生動定，真是茫茫更難自逆料。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我由西安奉命復返江西，第三次的就任贛南站長（時南昌淪陷，江西省站劃分贛南、贛北兩站）兼任該省保安處第四科長。

我由西安南返途中，經過重慶時，因工作必須向軍統局本部請示，曾在黃角壩中央飯店住

了幾天。蕭漫留同志(時任軍統局第一科軍事股副股長)，於我抵渝後翌日，即到中央飯店看我。他一見面就對我說：「老兄，你真是福人！那年我在江西省站，不僅吃盡了苦頭，幾乎連生命都難保全！……我於接任江西省站後不久，南昌即告淪陷，秘設在新建縣洪崖鄉的省站機關，迭遭奸偽破壞，電臺好久不能和上級通報，工作無法開展，幾陷於停頓狀態，戴先生對我，甚為震怒，結果我被命撤職調局待命，其不致遭受嚴重處分，蓋亦倖矣」。後來，其他同志告訴我，蕭漫留同志因在贛工作之慘敗，被調回重慶後，局本部負責人事部門同志，大家對他冷淡有加。那時候他住在兩路口一家小客棧裏，幾乎每天三餐不繼。還好有一天當他掩著帽側身在都郵街蹣跚獨行時，被戴笠先生發現了，詢悉他的生活近況後，才將他帶回局本部，發了他一筆特別費，隨着不久發表他為第一科軍事股副股長。第二天，戴笠先生在羅家灣紀念週上，曾宣佈其事，並責罵人事科、督察室對於一個同志何以如此漫不關心，置其生活於不顧。

那天蕭漫留同志，因和我談話，獲悉天水行營調查課我剛離職那個上校秘書遺缺，尙屬空懸待補，他立即央求我去電李課長向局請調，後來他竟得如願以償調往西安。但他真是命途多舛，到西安後不久，不幸又鬧出許多事故來。

最難忘的贛南之行

民國二十九年，雙十節日贛省保安處第四科正式成立，開始工作約一個月後，內外勤業務佈

置整頓，方告就緒，正擬抽暇赴贛南一行，視察所屬地區工作之際，忽奉命與經理室主任黃植蔭上校，車德俄上尉等三人，隨同省保安處處長廖士翹應贛州蔣專員經國先生之邀，前往贛南參加民國三十年元旦贛州各界慶祝大會。我對於「新贛南」的建設與治績，嚮往已久，有此機會，得償宿願，私衷甚感欣愉。「新贛南」，是今總統蔣經國先生主持江西省第四區行政專員公署時，苦心建設的贛縣、南康、龍南、定南、虔南等五縣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晨七時，廖士翹處長率同黃主任、車上尉與筆者及衛士等一行，分乘小轎車二輛，自泰和兩塘村起程，因山路紆迴，車行遲遲，約四小時始抵贛垣。贛州保安副司令吳驥上校(曾任省保安處第一科長率屬員等多人在車站迎接。當接往旅社小憩，旋即相偕驅車至專員公署，至則見蔣經國專員率屬迎於專署門前。是日在專署午餐後，由吳副司令陪同黃主任、車上尉及我等四五人，驅車外出，先環城一遊，見街道整潔，商店繁榮，路上行人，熙熙攘攘，異常熱鬧，真想不到在抗戰多年的大後方竟有如此一個整潔繁榮、朝氣勃勃的都市。車行至贛縣中山公園，時雖屆寒冬，見花木葱籠如故，遊人若鯽，園中設備，雖非上乘，然整潔有致。我們一行曾於公園下車，在茶座茗談片刻後，又繼續驅車先後至贛南托兒所、游民教養所、貧民醫療所、貧民產院等處參觀，惜為時間所限，每至一處，不能久停，深入考察，僅能走馬看花，稍事遊覽即行離去，深感懷然。

民國三十年元旦，贛州天氣晴朗，拂曉之際，贛州各界有組織的民衆五萬餘人，整隊聚集於××大運動場前空坪。為避免敵機襲擊，大會提前於上午七時舉行，首由蔣專員、廖處長等分別致詞並宣讀大會電文，高呼口號後，開始檢閱參加遊行民衆行列，由農民團體先導，農民們頭戴草笠，腳穿草鞋，肩負農用鋤具，依次為工人團體，商人團體行列，再次為學生團體，隊伍雄赳，整齊不紊，最後為軍、憲、警、自衛隊、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因遊行隊伍人數衆多，檢閱隊伍通過達兩小時之久，歌聲口號，歡呼震動，經過市衢，各商店住宅，咸鳴鞭炮，以示歡慶。當遊行隊伍經過各地之際，兩旁觀者如堵，人山人海，萬人空巷，堪稱贛州有史以來之空前最大盛會。

入晚，贛城內外，大放煙火，舞龍滾獅，鑼鼓喧天，高蹺采茶，民間雜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火樹銀花，城闌不夜，金吾不禁矣。是夕，家家戶戶，均高興快樂，充分表現「官民同樂」的景象。

這是我一生中難忘懷的一個元旦、難忘的贛南之行。我們於元旦次日，即匆匆地離開了這座歷史上的名城贛州(贛州為明代大儒王陽明施教舊治。)而返回泰和兩塘村。

元旦後約十餘天，日本飛機即大隊飛臨贛州城內上空，大肆轟炸，結果贛州繁榮街道不少商店，遭受慘重之損失。倘使敵機提前於元旦上午來襲，則所受災害，更不堪設想矣！

江西肅奸工作紀要

民國三十四年多，我奉命調江西主持第三戰區肅奸方面的監察任務。戴笠先生對於肅奸工作非常重視，曾記得臨行返贛州前幾天，他曾在重慶「漱廬」召見我，對於肅奸與策反工作親作種種訓示，並發給我一筆相當數目的特別費。

自重慶珊瑚壩飛機場搭機起飛，約四小時的航程，即抵漢口，在旅邸一宿後即換輪船於翌晨抵九江。下榻花園飯店，第二天乘南潯路特快車，三數小時即抵達牛行車站。闊別了數年的第二故鄉南昌，一旦重臨，有如遊子還鄉，身心愉快，非言可喻。在南昌我們仍卜居河東會館一二八號前江西省調查站辦公處樓上，第二天購辦辦公用品及日用家俱，第三天即開始江西肅奸委員會監察方面的工作。

軍統局對各地肅奸委員會的組織，早已有統一的編制。內勤業務，非常簡單，連同我自己，內勤人員僅八九人，多數是向省府調查室方面調用的。因為我的主要任務是監察肅奸任務之如限完成，而肅奸的行動是由江西省政府調查室主任鄧樹勛同志負責。但是當時所有逮捕漢奸的計劃與實際行動都是我和鄧樹勛同志兩人共同負責主持。

關於江西肅奸工作之進行，茲就記憶所及，略舉如下：

(一) 肅奸的佈置

①清理全省大小漢奸名冊，全省大小漢奸經呈報上級有案，應予逮捕者共約一百餘人。

②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漢奸都是居住南昌及九江兩地，因此決定南昌與九江方面在同一天深夜，(拂曉以前)開始逮捕行動，藉免走漏消息，

有所漏網。並決定南昌方面由鄧主任負責，九江方面由本人負責。擔任逮捕漢奸的執行人員，由調查室特務隊，肅奸委員會、和憲兵隊三方面會同酌派。執行任務出發前，各執行人員先行搜檢身體，將所有各個自己的財物交出，任務完畢，再行互相搜查身體。絲毫不苟，以示清白。

加蓋印信，封存之後交由保管逆產之人負責保管。計有：

①黃金：共約壹百餘兩，(多係首飾，絕無金條)。②白銀：現洋叁千餘圓，銀器(首飾)十餘斤。③現鈔：二十餘萬。④房產：四、五棟。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我從江西省站電臺方面，獲悉戴笠先生殉難的噩耗。我在他殉難後不久，即將肅奸方面的任務，告一結束，將在南昌、九江等地所獲大小漢奸壹百餘名，及所沒收的漢奸財產，全部移交江西省府調查室主任鄧樹勛同志接辦。

③所有逮捕到案之漢奸，一律寄押調查室特務隊所設之臨時寄押所內，嚴密看管，絕對不准和外面通訊，並禁止接見任何人。

三十八年多，我在重慶遇見了鄧樹勛同志，我會經詢問過他，那年所捕獲的那些漢奸後來究作何處置？他告訴我，那些漢奸連同沒收的逆產已全部解送江西高等法院去了。

④漢奸逮捕後，由劉士徽同志(曾任本局司法股軍法官)負責審訊。

這是值得我引為自豪，同時也足以告慰戴笠生在天之靈的事，就是他所交付我的肅奸監察方面的任務，我已毫無愧怍地完成了。(未完)

⑤是晚南昌、九江兩地逮捕漢奸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在南昌方面捕獲大小漢奸五十餘人(內一人為偽省長級漢奸)；九江方面，捕獲四十餘人；其他各縣鄉先後陸續捕獲二十餘人。

(二) 漢奸財產方面

江西漢奸的逆產，數目微小，出人意外。漢奸財產查獲之後，即清點數目，由鄧主任和本人

的敘述，既富史料價值，更富可讀性。

編輯報告

· 編者 ·

△傳奇人物鄧秀廷將軍，自民國十年至民國三十二年，在川康滇邊區剿辦夷匪，維護治安，除暴安良，川康滇邊區民衆對鄧將軍愛國保鄉功績，有口皆碑，尤其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西昌成爲後防重鎮。鄧將軍效忠國民政府牽制劉文輝與龍雲異動，在滇康邊區發生了最大的安定作用，何敏先生的「安邊怪傑鄧秀廷」對鄧將軍的功業有生動詳實

△今年爲革命元勳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本誌承華僑協會祝秀俠先生交來毛松年、汪公紀、梅友卓、柯叔寶先生等紀念文章，特提前在本期隆重推出，以饗讀者。

△蔣君章教授、陳頤教授、薛佩琦教授、戚宜君先生、耿心教授等的大作因排校不及，將在下期隆重推出，敬請讀者先生、女士期待。